

刘进宝 主编

BAINIAN
DUNHUANGXUE

历史·现状·趋势

百年敦煌学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敦煌学界对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日渐重视，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敦煌学的学术史研究，写出一本既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能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史，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

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开展对敦煌学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相信可以成为21世纪敦煌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



甘肃人民出版社



历史·现状·趋势

百年敦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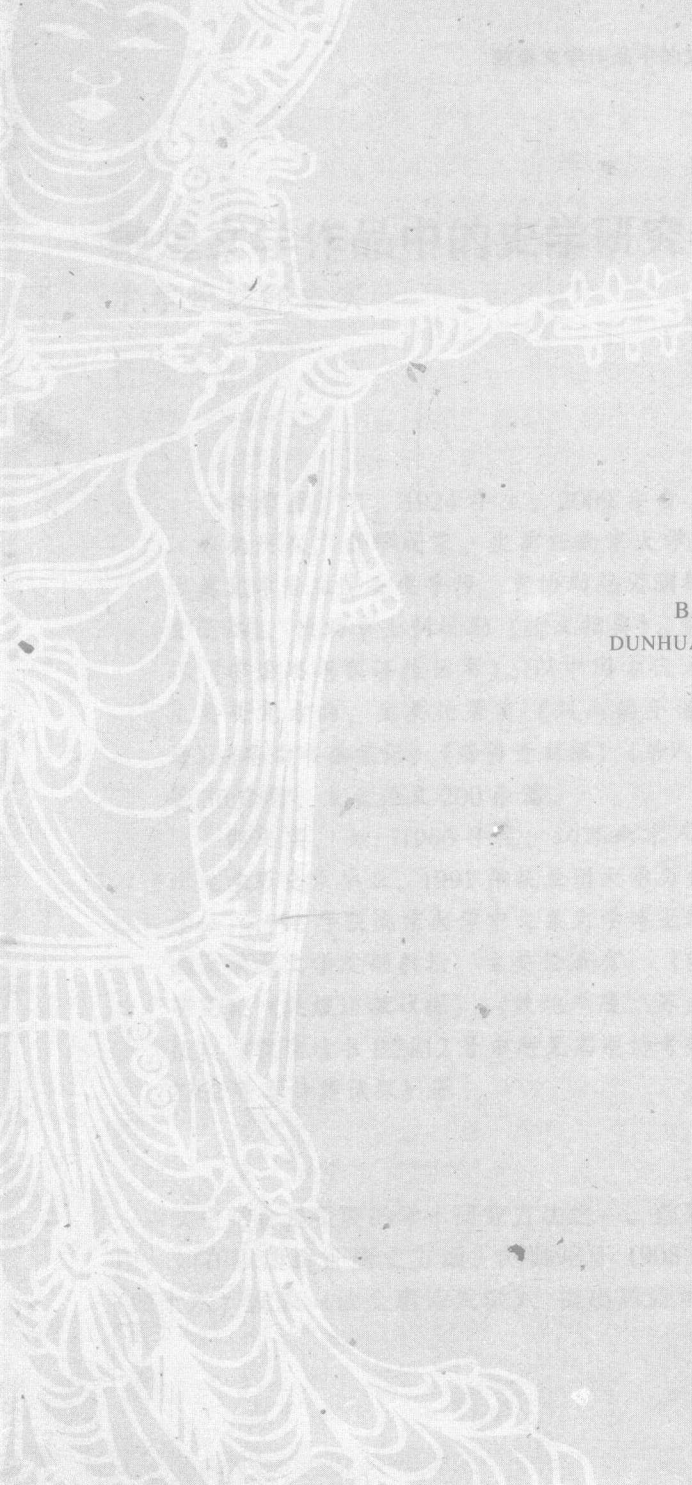
下

刘进宝 主编

BAI NIAN
DUNHUANGXUE



甘肃人民出版社



BAINIAN
DUNHUANGXUE



敦煌文学作品中的史学研究价值

卞孝萱 邵文实

卞孝萱，男，1924年生，2009年9月5日去世，江苏扬州人。自学成家。生前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协助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协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协助匡亚明编辑《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中国古代文、史、艺为主要研究方向，主要论著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冬青书屋笔记》、《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等3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邵文实，女，1966年生，江苏南京人。1988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1991年获兰州大学历史系史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论著有：《敦煌边塞文学研究》、《敦煌道教试探》、《敦煌李陵、苏武故事流变发微》、《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辨》、《敦煌P.2762等卷诗集试探》等。

文史结合是重要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一，前辈国学大师多所运用，如在以唐诗证唐史方面，刘师培于1908年在《国粹学报》（四十六）发表《读全唐诗发微》，提出唐诗可与史书互证的主



张；1933年，陈寅恪在《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二期发表《读连昌宫词质疑》（后经增改，于1950年收入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出版之《元白诗笺证稿》），进行了以唐诗证唐史的最初尝试，1944年又在成都作《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正式提出以杜甫诗证唐史之口号，在治学方法上，均突过前贤，别开生面，而这种方法更可推及唐人传奇等其他文学体裁^①。敦煌文献发现后，广受世人瞩目，研究日渐深入，在以文证史方面亦有颇多建树。陈寅恪在其1940年发表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谈及都城建筑时，指出唐代守卫宫城北门之禁军，以其驻屯地关系之故，在政变之际，其向背最足为重轻，故李唐一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所以往往系于玄武门卫军之手。“此点本甚明显，一检史文便可证知，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瞭然可知矣。”^②王重民利用敦煌写本《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作品，作《金山国坠事零拾》，“于是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一旦重逢，其快乐有不能言喻者”！如《白雀歌》“前段多采本地故事，后段则历叙朝臣之盛，兼及武功与政事，于金山国事坠失之余，得此可作一篇开国史读矣”^③！孙楷第利用敦煌本《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分别写成《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均从变文入手，考察湮没之史事。如前者云：“此敦煌写本变文，述使主张义潮事，盖即军府设齐会时为义潮所说之本。以事涉本州耳目切近，而史官纪事于边州例不能详；故其敷陈赞咏，足以考见当时之事者，较之史籍，反为详悉。斯虽断烂俗文，亦未尝无裨史学矣。”^④而后篇则曰：“两《唐书》记张义潮事皆甚略。至淮深守河西，唯《新书·吐蕃传》有‘命族子淮深代守归义’一语，全无事迹可见。……今观此本，则淮深御敌奏捷及朝廷使命往还之事，灿然满

帙，不特可补张氏一家之事，且关涉当时边情国势，其所赞叙有极足注意者。”^⑤其后更有许多敦煌学者围绕敦煌变文、诗词、散文等进行史学研究，成就纷然。利用敦煌文学作品进行历史研究已成传统，敦煌文学作品的史学研究价值可见一斑。在此仍可根据个人的心得，为此提供一些例证。

一、以敦煌小说探唐宫廷政变之实。除上文提及陈寅恪以 P.2640 号《常何墓志铭》证唐玄武门之变的史实外，敦煌其他写本也可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一些线索。如利用敦煌写本 S.2630 号《唐太宗入冥记》，即可洗清唐国史对玄武门之变的涂饰，了解此次武装政变的真相。

张鷟《朝野僉载》卷六对唐太宗入冥故事有所记载，但只提到“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对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冥官”与太宗的问答，却避而不谈。故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龙筋凤髓判》批评曰：“《僉载》纪事，皆琐尾摘裂。”然敦煌《唐太宗入冥记》残卷（下称《入冥记》），却能够提供这个故事的较为详细的内容。《入冥记》的要点是辨明“玄武门之变”的是非，将一代英主唐太宗理屈词穷的窘状描绘得栩栩如生，如借太宗之口，说出建成、元吉哀哭；借崔子玉之口，说出建成、元吉“称诉冤屈，词状颇切”，显示太宗杀兄弟之非。崔子玉劝太宗不能与建成、元吉“对直”，进一步表示太宗理亏。太宗“忙怕极甚”，以名利相诱，“苦嘱”崔子玉出一个容易回答的“问头”。问头中“□□（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十个字，毫不含糊地指出太宗的罪状。太宗看了问头，“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回答不出，只得以名利为条件请崔子玉代答。与把太宗形容得旷达、尊严、理直气壮的《朝野僉载》相比，《入冥记》把太宗描绘得心慌、胆怯、理屈词穷，十分窝囊，显见得《僉载》偏袒太宗而《入冥记》同情建成、元吉，这是文人笔记与民间传说的重要区别，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政治倾向。



从《入冥记》的内容判断，该作品当作于武周代唐之初。《入冥记》称李世民为“太宗皇帝”，太宗是世民死后的庙号，可见这个故事是世民死后编造的。《入冥记》称李建成、李元吉为“二太子”，元吉没有太子的身份，这个称呼不符合历史实际，却反映出一个情况：《入冥记》对元吉有好感。据《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向太宗夸武氏之美的当然是太宗身边的人。从武三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看出，武则天父（武士彠）母（杨氏）结婚，是高祖女桂阳公主“为婚主”。桂阳公主是武则天母亲杨氏的从兄弟杨师道之妻，两家关系甚近。而杨师道的从侄女、即武则天的姨姐嫁给了李元吉。元吉被杀后，太宗将她收继。长孙皇后卒后，太宗想立她为皇后，因魏徵反对而中止。武则天被太宗召进宫，立为才人，可能就是出于这位姨姐的推荐。武则天对姨姐的前夫元吉冤死有一种同情。为元吉鸣“冤”的《入冥记》是迎合武则天的产物。另外，《入冥记》中描述崔子玉劝唐太宗“讲”《大云经》，“抄写”《大云经》。此经是武则天称帝之符命，本罕为人知，因武则天的利用宣传而大显。《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记载：“（载初元年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卷一八三《外戚传·武承嗣传（薛怀义附）》又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可见讲《大云经》之风，始于武则天建周之时。《入冥记》中崔子玉劝唐太宗“讲《大云经》”的情节，不是武则天建周称帝之前所能空想出来的。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遭到徐敬业以及唐宗室的几次起兵反对，她深知改朝换代、以周代唐的不易，采取多种措施，为称帝扫除障碍。唐高祖、太宗、高宗祖孙三代中，太宗威望最高，降低太宗的威望，对以周代唐是有利的。在太宗一生中，杀兄弟是件亏心事，《入冥记》利用这件事降低太宗的威望，迎合了武则天的政治需要，

故撰写时间当在武则天以周代唐之初。武周政权巩固后，就没有必要了。可见，《入冥记》是一篇在佛教果报掩护下谴责唐太宗的政治小说。如果我们进而根据史书记载的自相矛盾之处，利用私家石刻等可靠资料，了解“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更可发现，《入冥记》在洗掉史书对“玄武门之变”的涂饰方面有着极大的帮助。从这一点来讲，《入冥记》已不再是单纯的民间故事，而成为具有很高史学研究价值的重要文献。

二、以敦煌诗歌、变文等探寻归义军政权更迭之谜。唐中央王朝有“玄武门之变”这样残酷的权利斗争，归义军政权内部也有节度使张淮深及其六子为兄弟所杀类似惨剧，其相关史事可借《张淮深墓志铭》等加以廓清，而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敦煌诗歌作品，也可为我们提供一点这方面的线索。S.6161、S.3329V、S.6973、P.2762号《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背后抄有十几首七言诗及两首五言诗，作者是经历了从归义军张淮深任节度使至张承奉立金山国这样一段时间的官员，暂时过着隐居的生活。^⑥诗集既反映了归义军收复河陇的斗争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反映了归义军政权的内部斗争。如《赠阴端公》下小注为：“子侄逆，遂成分别，因赠此咏。”此处的“逆”字，可释为“连逆”、“叛逆”之意。结合其后“唯有毗睚唇若噬，义门从此绝仁风”之句，知此子侄共同的连逆之举是相当严重的，无论是阴端公还是作者本人都怀有绝望之感，一般家庭的纠纷恐不会达到如此程度，唯一可信的，是当时归义军政权内部存在着对立的两派斗争，阴端公之子侄显然站到了阴端公的对立面，被认为是叛逆，这才引出了“遂成分别”的悲剧。从前人的研究可知，张淮深接任归义军节度使之后，二十余年未受唐政府的正式册封，故他曾前后多次遣使中原求授旌节。而其兄弟张淮鼎，因覬覦其权力，与淮深形成对立一派。其后张淮鼎终于杀死张淮深及其妻、子，自据归义军节度使之职。这表明淮鼎一派势力的强大。阴端公之子侄也许正是张淮鼎一派，使追随张淮深多年征战的阴端公



绝望。诗作者显然清楚地知道这种矛盾斗争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一方面隐居荒村以求避祸，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借诗咏志，感慨时局的不稳与人心的连逆。归义军的这段历史原本始终隐晦不清，各家研究做出的多种推测，现在这一诗集作者，虽然用了与张景球《张淮深墓志铭》中的“竖牛作孽”那样的语言，可终究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信息。

与武周时期出现《唐太宗入冥记》这样的小说对太宗行为加以谴责，从而达到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相类似，在敦煌归义军政权从张氏转向曹氏手中时，也出现了以文学作品讥讽政治对手的情况。从敦煌写卷情况看，有关李陵、苏武的故事在敦煌当地流传甚广，但其前后主题并不一致。在《李陵变文》中，人们对李陵抱着极大的同情：他们称赞李陵率五千步卒敌匈奴十大大军的勇气，宣扬其胜利的辉煌，当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之时，又处处铺陈，为李陵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而结合沙州人在吐蕃大军11年的围困下粮械皆尽，最终不得已降蕃的史事可知，《李陵变文》并非只是简单的史事的敷衍传唱，而是沙州人试图通过《李陵变文》，为自己降于吐蕃的行为作辩解。它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内容中深深寄托了沙州人痛苦、哀怨、愤懑、不甘的情感，具有宣传导泄的作用。《李陵苏武执别词》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苏武的问话，引出李陵的自我辩白，这与《李陵变文》之功用完全一致，只不过《李陵变文》是民间创作，而《执别词》却带上了文人色彩。

但是，李陵、苏武故事到了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建立了汉人政权之后，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此时，李陵不再是一个令人同情的落魄英雄。作于915年之前不久的《李陵苏武往还书》在敦煌多达五个写本（S.173、S.785、P.3692、P.2498、P.2847），其中李陵、苏武的情态与前面《变文》及《执别词》中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变化。在《李陵与苏武书》内，李陵只简单地叙述了自己投降匈奴的经过，通篇辩解之辞寥寥，后面的大段文字都是

劝降之语，令人感到李陵只是一个贪图富贵的功名利禄之徒。而苏武在其答书内，则毫不客气地将李陵比之为“见利而动”的“小人”，斥李陵“不堪为将”、“不信”、“不忠”、“为将不能励其兵”、“不孝”、“自迁拟入云霄，陷他人于沟壑”及“不忠”罪七条，然后表明自己“松柏为心，桑田变海，万物亏盈，仆终不改”的决心。苏武答书，完全把李陵放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也放在了民族、国家的对立面，它的义正词严，更令人觉得李陵之罪不可恕。此态度与自司马迁以来已形成的对李陵同情、为之辩护的情形大相径庭。这种情况，实际亦与敦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据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荣新江《金山国史辩证》^⑦等文的研究可知：910年秋，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得知唐朝灭亡的消息后，以瓜沙二州之地建金山国，并随即出征楼兰，取得胜利，接着又萌生夺取五凉全境之心，但在甘州回鹘的连续攻击下，张承奉迭遭失败，百姓怨恨。乾化元年（911），回鹘可汗弟狄银来犯，张承奉无力御敌，只好命城隍耆寿万人上书回鹘可汗，相议结为父子之国。张承奉因为连年征战，已失民心，现又认敌为父，俯首称臣，更使具有牢固中原情结的沙州人大失所望，根基动摇。当此之际，以曹议金为首的曹氏家族却悄然兴起。他们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外结四邻，内修政治，团结当地世家大族，成为众望所归。张承奉在位之时，曹氏已逐步将其架空，拥有沙州实权。914年，曹议金继替张承奉，成为瓜沙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曹议金夺取张氏政权是早有预谋的。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既然会利用各种手段笼络人心，就不会想不到去打击自己的对立面，为自己取而代之制造舆论。但这种做法又不可太露骨，因为张承奉毕竟还是皇帝。张承奉与回鹘作战失败，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为曹氏倒张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曹不会不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于是，在敦煌广为流传的李陵、苏武故事，又有了新的演绎，成为曹氏制造舆论的工具。题

为“辛未年（911）七月 日沙州百姓一万人状上”的P.3633《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下称《万人书》），是张承奉在与回鹘作战失败后授意敦煌耆宿写给回鹘可汗的信，里面已屈辱地将回鹘首领称为“天可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沙州形势和沙州百姓委屈、不甘的心态。拿它与《苏武报李陵书》比看，即可发现后者所隐含的政治目的：《苏武报李陵书》中给李陵列的头二款罪，是率然出兵，“枉费国家，徒倾万石之粮，枉陷五千之卒”。这正与《万人书》中对战争发动者的声讨一致。《苏武报李陵书》中前后屡次斥李陵不忠，与《万人书》中所强调的敦煌对中原的忠心耿耿形成对比。《苏武报李陵书》斥责李陵“今日却致说辞，令仆跪毛血之人，称臣虏地”，《万人书》中也几次提到张承奉与回鹘订立的父子之盟，言“函书发日，天子面东跪拜”，较前者带有更强烈的屈辱感。将李陵之罪列完，《苏武报李陵书》中苏武又表示了自己对汉的忠心：“仆且松柏为心，桑田变海，万物亏盈，仆终不改。”而《万人书》最后言：“沙州本是善国神乡，福德之地。天宝之年，河西五州尽陷，唯有敦煌一郡不曾破散。直为本朝多事，相救不得，口没吐蕃。四时八节，些些供进，亦不曾辄有移动。经今一百五十年，沙州社稷，宛然如旧。”也是对沙州人民誓心依唐行为的追述，强调了对唐的忠心耿耿。两者相较，均是自申自明，心境相同，都有极强烈的感染力。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苏武报李陵书》中给李陵罗列的每一条罪名，几乎都有所指，无一不将矛头指向张承奉，而又以己方作为苏武那样的百姓代言人，表示出不降回鹘、誓心归唐的决心。这正是沙州民心所愿，自然将备受感荷。《往还书》是曹氏迎合百姓心态、贬斥张承奉之作，不言而喻。“苏武”（曹氏）的行为既深入人心，“李陵”（张承奉）便失道寡助，灭亡是必然的。作品通过寄兴与“怨刺”，完全达到了政治斗争中所需的宣传作用。

从为争夺皇权而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到为争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之职而张淮深举家被害，历史总有些残酷的相似之

处，而通过杀戮成为掌权者的人，总是要想方设法地隐瞒事实真相，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三次坚持要看国史，名义上是“用知得失”，“以为鉴诫”，实则是要为“玄武门之变”定下“管、蔡既诛，成、康道正”的调子，为自己杀害兄弟之举涂饰。敦煌地处偏隅，归义军节度使大权在握，故张淮深的死亡也成谜团，无人敢秉笔直录；张承奉虽不得民心，但贵为金山国天子，臣下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示反对。如果仅凭对当权者多有回护或根本没有记载的正史，那么后人就很难发现历史真相。而敦煌的一些文学作品，却能够从另外的角度提供不为人知的信息，《唐太宗入冥记》为建成、元吉喊冤，《李陵苏武往还书》对李陵极尽讽刺之能事，都可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注释：

- ①参见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鹭江出版社，2003年）。
- ②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0~71页。
- ③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六号。
- ④载《大公报图书副刊》154期，转引自兰州大学历史系编《敦煌学论文选》第203页。
- ⑤载《史语所集刊》第七本三分册，转引自州大学历史系编《敦煌学论文选》，第207页。
- ⑥参见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1~82页。
- ⑦《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3~85页。



敦煌文献与中国历史研究

宁 可

宁可，男，1928年生，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主要论著有《宁可史学论集》、《宁可史学论集续编》、《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主编和参加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等。

1900年旧历五月，正当八国联军攻陷大沽，进逼京津之际，中国西北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由于一个偶然的时机打开了，封闭了700余年的5到11世纪的5万余件文书重见天日，成了珍贵的文物，也成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新史料的发现并非少见，但藏经洞文献却具有与一般新史料不同的价值与特点，以至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一股学术的新潮流，形成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敦煌学。

这些特点是：

第一，数量大，达五万余件，还有一千余幅绘画、刺绣。一个地方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资料，是极少见的。

第二，时间长，从5世纪到11世纪，达700余年。

第三，关联性，都是敦煌地区的文献，彼此在时间、空间与内容上，往往有所关联，利于参照、印证、综合的研究。

第四，类型多，举凡佛、儒、道经典、记录，各类书籍、官府文书、私家文献、寺院档案，以及诗词变文、日用杂字、星历占卜，几乎应有尽有；而且还包括了汉文以外的藏、突厥、回鹘、于阗、梵文等文字的资料。

第五，涉及方面广，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艺术、民俗学、科技史等等方面的研究，都能从这里获得丰富的资料。

第六，敦煌地区丰富的历史遗存，长城烽燧，汉晋墓葬，尤其是与敦煌文献同时期的以莫高窟为首的石窟群中保存完好的大量壁画与雕塑，都可以同藏经洞文献参照、结合，进行研究。

第七，敦煌的独特地位，它既是中原王朝的西陲，与周边的民族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是古代东西方交往要道丝绸之路上的要冲。这些，在藏经洞文献中都有鲜明的反映。因此，藏经洞文献既具有地方文献的意义，也具有全国性文献的意义，既具有汉族历史文化意义，也具有周边民族历史文化的意义，具有汉族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关系的意义，还具有世界历史文化的意义。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也是其他新发现的史料所少见的。

这些特点，显示了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史料价值，也显示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向。

第一，研究敦煌地区的历史。敦煌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不大的地区，却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区，它既具有古代中国所具有的共性，又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藏经洞文献为我们提供了5—11世纪，尤其是8—11世纪吐蕃与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历史的非常丰富和非常具体的资料。既可作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

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的细致研究，尤其可以作 8—11 世纪敦煌社会历史的整体的研究。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第二，研究 5—11 世纪的中国历史。敦煌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具有共性。有许多问题，在过去的传世文献中或者记载笼统，语焉不详，或者记载缺失，或者尚多歧义，而藏经洞文献对之却有当时的具体细致翔实的记录，这就大大有助于探明这些问题的真相，廓清疑误。像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制，原来仅从已有的史籍文献中探析，不免只具轮廓，疑点甚多，而且许多细节不清楚，因而影响了对整体的认识，以至有了唐代均田制是否实施过的争论。借助藏经洞文献中有关的第一手资料，终于弄清楚了均田制的许多具体情况，也解决了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连带着对北朝隋唐的户籍制度也有了清楚的认识。又如唐宋寺院的组织管理、寺院经济的经营、寺院的佛事活动、寺院与官府的关系等等，也是靠敦煌文献中的大量材料才凸显出来（虽然带有明显的敦煌特点）。又像唐宋社邑，尽管有其他文献的记载，但敦煌文献中的 300 多件社邑文书却使我们能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古代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有了一个具体清晰的认识。这些，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考察自然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敦煌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敦煌地处边陲，周边有许多民族，诸如吐蕃、回鹘、于阗、粟特等等。这些民族，传世文献记载很少，而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不仅有汉文材料，而且还有这些民族自己的文字记录的材料，这给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条件，而且还可与新疆等处出土的这些民族的遗址遗物与文字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考证。尤其是吐蕃，在唐后期统治敦煌地区 60 余年，给敦煌的历史打下深厚的烙印，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更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最好材料。

第四，关于中外关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敦煌位居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古代印度、中亚、波斯，还有后来的伊斯兰文化都经过这里与中国文化接触并进入中

国内地，而中国文化也从这里远去西方。像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敦煌是汉文化的门户，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佛教中国化历程可说就是从敦煌地区开始的。印度的制糖技术也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甚至中东历法上的星期天“密日”，也在敦煌汉字日历日上标示出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将近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敦煌学历史方面的研究，就是循着上述方面逐步开展的。其所以说是逐步开展，是因为材料很多，释读亦有困难；更重要的是五万余件文献由于外国人的攫取与中国人的盗卖，其中四分之三流散在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处地方，检阅困难。最早，中国学者只能根据外国学者提供的，或外国学者发表的著作中的少量文献录文、照片图版，以及几位中国学者在英法寻访带回的录文、照片进行工作。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也大大限制了更多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但中国学者也有优势，那就是当西方学者更多地从所谓东方学、中亚学的角度，着意于中亚西域的语言文字和民族方面的时候，中国学者却因具有汉族历史文化的深厚素养而着意在汉文文献。按照传统的学术路子，首先注意的是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古籍及已有古籍与传世版本的校勘。对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与音韵方面文献的研究整理，贡献尤多；对敦煌地区的历史，主要是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也有不少研究成就。囿于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子，除了陈寅恪先生等很少人外，对其他方面涉及甚少甚至没有涉及。

这样的情况，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有了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者对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有关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敦煌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资料开始被发掘和运用。隋唐五代土地关系尤其是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讨论一时形成热点，讨论的各方面都研究及运用敦煌文献有关材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就是一例。50年代中期，伦敦英国博物院所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到了中国；随后中国的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敦煌遗书总目